

京師大學堂

莊吉發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京師大學堂

莊吉發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京師大學堂 / 莊吉發著.-- 再版.-- 臺北市：
文史哲，民 105.11
頁；公分（文史哲學集成；692）
ISBN 978-986-314-337-6（平裝）

1. 京師大學堂 2. 歷史

525.8211

105021472

文史哲學集成

692

京師大學堂

著者：莊吉發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 www.lapen.com.tw](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定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1970年（民五十九）九月初版

2016年（民一〇五）十一月再版

著財權所有·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86-314-337-6

00692

京師大學堂

前言

京師大學堂的前身是京師官書局，而官書局的前身則是京師強學會。本文的討論範圍，就是從強學會開始至民國成立後京師大學堂改爲北京大學爲止。本文撰寫的主要目的是在敘述京師大學堂的創立經過，教育宗旨，課程內容，學制系統，學生的來源與出身獎勵，訓導方針，以及經費設備等問題，並進一步分析「中體西用」的思想何以成爲清季創辦京師大學堂的理论基礎，且戊戌政變以後，清廷將「百日維新」以來的各種新政設施一一推翻，何以唯獨給京師大學堂留下發展的餘地？學校與科舉如何合而爲一？

清末民初之際，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值中西思想的衝突，這正是新舊交替的過渡階段，教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上層結構，中英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社會既已發生巨大的改變，其教育制度勢難再墨守舊規。另一方面要清季知識分子完全揚棄中國的價值系統，而全盤的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則又顯得更加困難，清季知識分子一方面向過去回顧，一方面向未來瞻望。他們既欲維護儒家的道統，同時又須博採實用的西學。因此，「中體西用」就成了清季知識分子接受

西化的基本原則。

京師大學堂開辦以後，對於教育宗旨的頒佈，新學制的釐革，人事制度的建立，課程標準的制定等，在在都能促進京師大學堂的發展。爲使從政人員具備現代國民的基本條件：通達時務；健全品格；強壯體魄，因此，京師大學堂的教育內容與訓導方針都特別強調智德體並重的通材教育，這就是新教育與舊教育在內容與方法上根本相異的地方。

京師大學堂在創辦之初，教育尙未普及。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來源多爲科舉出身的人才。同時，由於科舉尙未廢止，任官制度猶未建立，不得不沿用科舉掄才的成規，使學校與科舉並行不悖。學堂畢業的學生給予實官獎勵，分等錄用，一方面是在放寬仕進之途，另一方面却藉以開通教育風氣。

京師大學堂的訓導目標既在培養學生明體達用的忠愛精神，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間京師大學堂學生所發起的拒俄運動，就是學生忠君愛國的具體行動。京師大學堂的教育精神既帶有救亡圖存的性質，因此，京師大學堂的創辦，在清季教育改革運動中就顯得特別的重要。

京師大學堂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創立經過……………一

第一節 思想背景……………一

第二節 緣起與定議……………八

第三節 正式開辦……………一七

第二章 沿革……………二七

第一節 建置……………二七

第二節 學制……………三三

第三節 課程……………四三

第四節 人事……………五五

第三章 教育實施……………六三

| | | |
|-----|--------|-----|
| 第一節 | 教育宗旨 | 六三 |
| 第二節 | 教材與教法 | 六七 |
| 第三節 | 學生入學 | 七七 |
| 第四節 | 成績考查 | 八四 |
| 第五節 | 出身獎勵 | 八七 |
| 第四章 | 訓導與管理 | 一〇〇 |
| 第一節 | 生活規範 | 一〇〇 |
| 第二節 | 愛國表現 | 一〇七 |
| 第五章 | 經費與設備 | 一一五 |
| 第一節 | 經費來源 | 一一五 |
| 第二節 | 校舍修建 | 一二三 |
| 第六章 | 附屬機構 | 一二九 |
| 第一節 | 譯學館 | 一二九 |
| 第二節 | 進士館 | 一三一 |
| 第三節 | 博物品實習科 | 一三六 |

第四節 其他……………一三七

第七章 結 論……………一四二

附錄：

一、京師大學堂歷任職員一覽表……………一四六

二、京師大學堂各科教習一覽表……………一五五

三、京師大學堂師範科第一次畢業獎勵學生一覽表……………一六七

四、京師大學堂師範科第二次畢業獎勵學生一覽表……………一七四

五、京師大學堂預備科第一次畢業獎勵學生一覽表……………一八七

六、徵引書目……………一九六

本書英文提要

第一章 創立經過

第一節 思想背景

「中體西用」是清季創辦京師大學堂的理论基礎。

中英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以後，國人震於西方的船堅礮利，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於是漸漸產生一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註一）當時的一般知識分子都認爲西人所擅長的不過是機械製造而已，中國的政教制度，風俗習慣，無不優於西人。如以中國倫常名教爲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最後必能駕而上之。（註二）

同治初年，王韜以爲中西學術的主要區別在「道」與「器」：

「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如徒頌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爲治之本原者。」（註三）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鄭觀應對中西學術的態度，則提出本末主輔的看法：

「善學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後可言西學。分而言之，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

(註四)

近人東京大學教授加藤常賢等對「中體西用」論的緣起，認爲是同光年間西法模仿時期，維新人物爲了要說服守舊派而建立的中西調和論：

「中學者，卽孔子之道，爲融貫古今中外舉世無雙之精神文明。此實學問道德之根柢，故須固守不渝。至如機械之西方物質文明，雖爲富國強兵所不可或缺，然非永恆不變之道，僅止於有利用價值耳。此顯係當時維新派之官僚輩爲推行洋務運動，欲合理說服反對派所建立之理論，實非僅爲一時權宜之計。由此，可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對儒家信仰之根深蒂固。」(註五)

主持洋務運動者，有了「中體西用」的理論武器，以抗拒守舊派的攻擊，因此，一方面爲了富國強兵，可以採納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另一方面爲了維護中國的道統，對儒家信仰抱着絕對服膺的態度。「中體西用」就成了清季知識分子接受西化的公式。但當時一般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僅止於器物一層，故同光年間興辦學堂的動機，完全是爲軍事起見，或爲造就繙譯通使人才起見。(註六)實無意採取西方教育制度以代替中國舊式教育制度。京師同文館，各省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強學堂等雖爲清季設立新式學堂的濫觴，惟其於西學範圍，不過粗習皮毛而已。鄭觀應會論其得失云：

「同文館雖羅致英才，聘西教習，要亦不過祇學言語文字。若夫天文、輿地、算學、化學、

直不過粗習皮毛而已。他曰水師武備學堂，謹設於通商口岸，爲數無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認真學習。」（註七）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亦指出諸館設立二十餘年，而國家不一收奇才異能之用，其主要原因便是「諸學徒習西學、西語、西文，而於治國之道，富強之原，一切要書，多未肄及。」（註八）京外各學堂，既囿於一材一藝，斤斤於語言文字，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體，先厭華風，故辦理垂數十年，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

鴉片戰爭，中國因不知敵之強而敗；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中國則因不知敵之所以強而敗。同光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新政認識不足。中西接觸既以兵戎相見，主持洋務者，僅知西器可用，西技當師，以「堅船利礮」爲西人富強之由，而不知政教制度才是西人富強的基礎。甲午戰爭，堂堂天朝，竟敗於蕞爾小島的日本。洋務運動既受了挫折，爲洋務運動作支柱的「中體西用」的思想基礎其意義亦隨之轉變。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正月，貴州學政趙惟熙於「請開設譯書公局疏」中，已指出西人富強之原，不僅在兵事一門：

「局譯之本，多專重兵事一門，不知泰西之政藝各學，整齊畫一，釐然秩然，實得我古先聖王遺意。至兵之一說，乃不得已而用之。西人之所以富，所以強，全不繫此。不本之務，惟末是圖，即使果能勝，而兵兇戰危，所傷實多，故譯書當以政學爲前，藝學爲次。」（註九）

甲午戰後，由於「中體西用」論在意義上的轉變，西學的範圍，已遠較洋務運動時期李鴻章等輩所主張的更爲廣泛。在教育思想方面亦從以實用爲主的西藝教育思潮，轉變爲以制度爲重的西政教育思潮。梁啓超認爲政藝之學，難易不同，緩急有別：

「無徒重西文教習，而必聘通儒爲華文教習，以立其本；無僅學西文，而必各持一專門之西學，以致其用，斯二義者立，夫乃謂之學。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爲主義，以藝學爲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耳。」（註一〇）

張之洞亦認爲如政治之學不講，則工藝之學不得而行，因此在教育上主張政藝兼學：

「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聲、光、化、電，西藝也。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

（註一一）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對「中體西用」的看法，雖仍主本末主輔或內外新舊之分。（註一二）但都以融貫中西學術，調和新舊思想爲宗旨，他們對西學的態度，已由等量齊觀，進而求中

西學術的會通。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軍機大臣等於「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疏」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於中西學術不能會通之弊云：

「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轍，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註一三）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亦云：

「竊維中國人才衰弱之由，皆緣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故由科舉出身者，於西學輒無所聞知；由學堂出身者，於中學亦茫然不解。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註一四）

質言之，應消泯中西的界限，化除新舊的門戶，體用並舉，不使偏廢。

清季知識分子爲說明今日的西學，乃是中學流入西土後，西人踵而行之，推陳出新，故能擅名異域，於是又提出「西學源出中國說」，其宗旨則欲以中國固有之學，還之於中國。此種中西學術的同源異派合流的理論，更易爲當時知識分子所樂於接受。同治初年，恭親王奕訢於「酌議同文館疏」中已發其端：

「查西說之源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目爲東來法，特其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遂

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中國儻能駕而上之，則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淺鮮。」（註一五）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正月，總理衙門於「議覆籌設官書局疏」中，對「西學源出中國說」，更是娓娓言之：

「西人之學，無不以算學爲隱括。西算之三角，與中算之句股，理無異同。周髀經曰：『圓出於方』。又曰：『方數爲典，以方出圓』。言圓之不可御而馭之以方。西人三角八線之法，實基於此。餘若天學、化學、氣學、光學、電學、礦學、兵學、法學、聲學、醫學、文學、製造等學，皆見中國載籍。試取管、墨、關、列、淮南諸書，以類求之，根源具在，可知西學者，中國固有之學，西人踵而行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耳。」（註一六）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嚴復發表「原強」一文，以物競、天擇二篇尤爲著稱，開始有系統的介紹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物種由來」（Origin of Species）的學說。次年復譯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達爾文以萬物爲一本，始於同，而終於異。赫胥黎的天演論，其思想即導源於達爾文，赫氏謂天演云：

「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

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註一七）

其後，斯賓塞（Spencer Herbert 1800-1903）引用演化論的觀點以解釋人類社會現象。比及演化論的思想盛行於中國後，清季知識分子復引用演化論來說明自強之道。同時，今文學家復引用演化論以說明「通三統」與「張三世」的思想。所謂「通三統」，即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所謂「張三世」，即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其思想正符合演化論的變異法則，這就是康有爲等輩主張變法維新的理論基礎。（註一八）大抵據亂世競力，升平世競智，太平世競德。易言之，據亂世是以力服人。升平世是以智服人，太平世是以德服人。洋務運動時期的軍事建設，是競力的表現，甲午戰爭以後的教育改革則是競智的表現。「智」既可以勝「力」，欲保種保教必先開民智，方足以言自強。這就是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鑒於軍事改革的失敗，轉而嘗試從改革教育入手以圖富强的主要原因。皮鹿門於「論保種保教均先開民智」一文論之極詳：

「數十年來，紅種、黑種之人，日少一日，惟白種人獨盛。所以各種皆微，而白種獨盛者，由於強弱不同，實由智愚迥異。紅種、黑種皆野蠻不知學問，雖性獷悍，能以力强，不能以智強，故雖竭力與白種爭，終爲白種之所剪滅。強以智，不强以力。如徒以力强而已，牛馬有力，而爲人服役；虎豹尤強，而爲人擒獲。其所以爲人服役，爲人擒獲者，由無智也。」

（註一九）

演化論風靡中國以後，更加深了清季知識分子對「中體西用」的根深蒂固的信仰，進一步提供可變的法則，此卽道不可變，法則必變的思想，很快的成爲當時知識分子的共通觀念，以道爲體，以法爲用。中學固有中學之體用，西學亦有西學之體用。皮鹿門論之尤詳：

「蓋千古不易者道也，歷久必變者法也。道與法判然爲二，非可并爲一。讀禮記大傳曰：『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注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等道理，亘古今，通中外，未有能易者。」（註二〇）

「中體西用」的觀念，雖然發軔於鴉片戰爭，但其盛行却在甲午戰爭以後。「中體西用」的界說，雖然互不一致，但已成爲清季知識分子的共通觀念，則彰明昭著。「中體西用」遂成爲清季創設新式學堂，訂定宗旨，確立學制，頒佈課程，編纂教材的思想基礎。京師大學堂就是直接承受當時「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潮而創立的。京師大學堂新舊兼學，政藝並重，中西教習濟濟一堂，中西課程同時並立，這就是「中體西用」教育思想的具體表現。

第二節 緣起與定議

清季於京師創立大學堂，係就官書局推廣而來，官書局的前身則爲京師強學會。（註二）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三月，中日議和時，適爲會試年，各省舉人齊集京師。康有爲倡議上書拒簽和約，於四月初八日遞呈都察院，是爲「公車上書」。因言論激切，廷臣拒不代奏。馬關和議甫定，康有爲適登進士，授職工部主事。閏五月初八日，康有爲復上書主張變法，工部堂官皆不以爲然，置之不問。康有爲深慨國內風氣閉塞，廷臣守舊，阻撓新政，爲提倡新學，開通風氣，乃轉而欲倡導於下，以喚起國民的議論，振奮國民的精神，於是捐資集股，在京師創辦萬國公報，每日刊送二千份。同年七月，康有爲與文廷式、陳熾諸人議設強學會於京師後孫公園。（註三）會員百數十人，京朝士大夫自尙書、侍郎以至翰林、科道中有志維新者，如孫家鼐、李端棻、徐致靖、張蔭桓、楊深秀等人皆名列會籍。（註四）會中購置圖書儀器，資人觀覽，以期輸入世界知識於國民。會員每十日集會一次，除講學而外，兼以議政，故強學會實兼學校與政黨兩種性質。（註五）強學會內部組織，有董事、提調、會辦、坐辦等名目，由開辦人內公推。（註六）其任務可分爲五大端：①譯東西文書籍；②刊布新報；③開辦圖書館；④設博物儀器院；⑤建立政治學校。因此，清廷視之爲強學書局。（註七）同年九月，復設強學分會於上海，推張之洞爲會長。（註八）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爲曾撰序文云：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爲中國，岌岌哉！沉磨牙涎舌，思分